

歷史的啟示

— 重印 《甲申三百年祭》 —

十三年五月...

...

...

...

...





歷史的啟示

重印 乙甲申



杨瑞广 编

历史的启示
——重印《甲申三百年祭》
LISHI DE QISHI
杨瑞广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装

850×1168 mm 32开 2.5印张 50,000字 00,001-30,000册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5073-0082-X/K·10 定价：1.60元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同到西苑机场欢迎的郭沫若同志交谈。

60J12/44

编 者 的 话

明年十一月十六日，是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又为了给全党进行促廉反腐斗争提供一本有益的教材，我们现将郭沫若同志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读《甲申三百年祭》，不可不读本书选收的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给郭沫若同志的信，它可以帮助我们领会《甲申三百年祭》所揭示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真谛。同时，为了帮助读者思考《甲申三百年祭》的现实意义，我们特选收了最近出版的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的一节——《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

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首次与读者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的重庆《新华日报》。这篇力作刚一问世，立即引发了郭沫若同志未曾预料到的中国政坛的巨大震动。国民党顽固派的先生们，犹如蝙蝠害怕阳光一样，把郭文视为“大逆不道”，立即由陶希圣领衔，动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围剿”。而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则以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睿智眼光，视郭文为不可多得的瑰宝。四月十二日，他向党的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讲道：“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接着，四月十八、十九两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为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提供了新的学习文件。该报的编者按语指出：《甲申三百年祭》是“科学地解说了历史。”赞扬：“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并斥责国民党顽固派对郭文的“围剿”，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五月，延安的新华书店总店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踏李自成的覆辙。”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在延安，在其他解放区，广大党政军干部，热烈学习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种学习，无疑是在胜利的形势下，给党、政、军领导干部“注射”了防骄防腐的预防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兴致勃勃地致信郭沫若同志，对《甲申三百年祭》倍加赞扬，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此后，一九四八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有的地区的党委，再次决定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号召广大党政军干部学习，又一次给即将把工作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广大干部“注射”了防骄防腐的预防针。

这里，我们不能不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及时敲起的防止骄傲、防止蜕变的警钟。他在讲话中高瞻远瞩地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要高度警惕和预防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他谆谆告诫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用。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

作风。”建国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是依照上述精神，对于保持和发扬全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于预防和平蜕变，抓得很紧很紧的，对于刚刚露头的某些腐败现象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芟除，并为此开展了雷厉风行的“三反”斗争，从而使得我们党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从污泥浊水中脱胎出来的新中国，呈现出一派清新祥和的良好社会风气。后来，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再次把防骄防腐的任务提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面前。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讲话时，号召高级干部重温《甲申三百年祭》。他说：“在七大前整风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推荐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三百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温一下。”在周总理的提议下，许多同志又重新学习了《甲申三百年祭》。五十和六十年代，有的出版社又重印了此书。

《甲申三百年祭》从问世到现在已是四十七个春秋了，它所揭示的历史经验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年春天，江泽民同志到古都洛阳视察时曾经说：“早在进城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告诫我们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总结李闯王的教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斗争搞不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后来，他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讲话中，当谈到必须反对贪污腐化、反对行贿受贿，防止敌对势力以此为缺口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时，

再次提起：“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要大家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的讲话寓意深长。最近出版的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老在追述了毛泽东主席自延安整风起一直铭记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所提示的历史经验后说：郭文“不乏精炼之笔，是脍炙人口的力作。”赞誉之情，跃然纸上。

现在，我们再次把《甲申三百年祭》推荐给读者，特别是推荐给肩负重任的高中级干部，希望它有助于提高全党对“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命题的认识，有助于提高全党戒骄戒躁、增强团结、反腐防变、勤政廉洁的自觉性，从而在思想上筑起防止和平蜕变的铜墙铁壁。

此外，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甲申三百年祭》写作的历史背景、写作经过及其历史地位，本书还选收了王守稼、缪振鹏二同志合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刘修明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地位》两文，供读者参阅。

本书编辑中，得到了“郭沫若故居”同志的热情支持，特此致谢。

一九九一年七月

(杨瑞广执笔)

目 录

致郭沫若毛泽东(1)

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3)

关于李岩郭沫若(34)

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薄一波(36)

《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

的地位王守稼 缪振鹏(44)

《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地位刘修明(66)

致郭沫若^[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2]，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3]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4]，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选自《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2]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3] 太平军，是洪秀全等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先后转战桂、湘、鄂、赣、皖、苏、浙等十余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但是，太平军在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它不能抵抗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于一八六四年遭到失败。此后它的余部又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4]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一九二九年写的反映自己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生活经历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五八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六卷。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

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

① “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子·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

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的了。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海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修明的，那么挹彼注兹，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反正额又欲美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漕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

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
衒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璉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
臣宰助饷。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
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璉
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
法^①。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
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
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
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②，
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③者也。此议一倡，亡命

-
- ① 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宋神宗时吕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
- ② 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传》。——作者注
- ③ 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